

石芳勤 编

谭人凤集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石芳勤 编

谭人凤集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湖南人民出版社



湖湘文库
甲编

湖湘文库
甲编

PDG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谭人凤集 / 石芳勤编.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8.1

ISBN 978-7-5438-4940-2

I. 谭… II. 石… III. ①谭人凤 (1860-1920) - 文集
②政论-中国-文集 IV. D69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125066号



湖湘文库(甲编)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谭人凤集

著	者	谭人凤
编	者	石芳勤
责 任 编 辑		穆陵宁
整 体 设 计		郭天民
出 版 发 行		湖南人民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hnppp.com
地 址		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 编		410005
营销部电话		0731-2226732
经 销		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960×640 1/16
印 张		29.25
字 数		317000
书 号		ISBN 978-7-5438-4940-2
定 价		86.00元

ISBN 978-7-5438-4940-2



9 787543 849402 >

数字图书馆
PDG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

顾 问 张春贤 周 强 杨正午 周伯华 胡 彪
肖 捷 许云昭 戚和平 谢康生 文选德
孙载夫
组 长 蒋建国
副组长 郭开朗 王汀明
成 员 李凌沙 姜儒振 吴志宪 李友志 刘鸣泰
朱建纲 龚曙光 金则恭 朱有志 刘献华
钟志华 刘湘溶 彭国甫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 刘鸣泰 朱建纲
副主任 李凌沙 吴志宪 田伏隆 王新国
尹飞舟 龚曙光 唐浩明
成 员 唐成红 曾鹏飞 毛良才 刘国瑛
陈壮军 王德亚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主 任 文选德
第一副主任 刘鸣泰
常务副主任 张光华 彭国华 张天明
副主任 熊治祁 夏剑钦 朱汉民 曾主陶 黄楚芳
委 员 李建国 丁双平 汪 华 刘清华 黄一九
彭兆平 周玉波 雷 鸣 王海东 韩建中
谢冠军 杨 林
装帧设计总监 郭天民

出版说明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特别是近代以来，一批又一批三湘英杰，以其文韬武略，叱咤风云，谱写了辉煌灿烂的历史篇章，使湖湘文化更为绚丽多彩，影响深远。为弘扬湖湘文化、砥砺湖湘后人，中共湖南省委、湖南省人民政府决定编纂出版《湖湘文库》大型丛书。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以“整理、传承、研究、创新”为基本方针，分甲、乙两编，其内容涵盖古今，编纂工作繁难复杂，兹将有关事宜略述如次：

一、甲编为湖湘文献，系前人著述。主要为湘籍人士著作和湖南地区的出土文献，同时酌收历代寓湘人物在湘作品，以及晚清至民国时期的部分报刊。

二、乙编为湖湘研究，系今人撰编。包括研究、介绍湖湘人物、历史、风物的学术著作和资料汇编等。

三、乙编中的通史、专题史，下限断至1949年。

四、甲编文献以点校后排印或据原本影印两种方式出版。

五、除少数图书以外，一律采用简体汉字横排。

六、每种图书均由今人撰写前言一篇。甲编图书前言，主要简述原作者生平、该书主要内容、学术文化价值及版本源流、所用底本、参校本等。乙编图书前言，则重在阐释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视角和主要学术观点等。

七、对文献的整理，只据底本与参校本、参校资料等进行校勘标点，对底本文字的讹、夺、衍、倒作正、补、删、乙，有需要说明的问题，则作出校记，一般不作注释。

八、甲编民国文献中的用语、数字、标点等，除特殊情况外，一般不作改动。乙编图书中的标点、数字用法、参考文献著录规则等均按现行出版有关规定使用和处理。

《湖湘文库》卷帙浩繁，难免出现缺失疏漏，热望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





谭人凤像

資
平
知
學

PDG

前言

1

谭人凤是近代中国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革命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了推翻清朝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和捍卫民主共和制度，他跟随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赴汤蹈火，百折不挠，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在海外也产生了良好的影响。谭人凤颇为激进思想和政治主张，主要体现在他的文稿、演说、函电、日记和具有自传性质的《石叟牌词》之中。在他生前和谢世后的几十年中，这些文稿均未汇编成专集。为此编者曾到谭人凤的故乡和他在国内主要活动过的地方进行调查访问，翻阅了当时主要报刊和后来包括台、港在内的我国出版的有关书刊，将搜集的谭人凤的文稿、函电等，编辑成这部《谭人凤集》，奉献给广大读者。《谭人凤生平大事记》等有关资料附录于后，以供读者参考。

（一）

谭人凤，原名有府，字符善，又字石屏，晚年自号雪髯，人称他为谭胡子。1860年9月20日（清咸丰十年，庚申，八月初六）生于湖南省新化县福田村（今属隆回县鸭田镇南湾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20年4月24日病逝于上海。终年60岁。

谭人凤的故乡福田村，是一个离县城百余华里的深山区，靠近黔、桂边界。当时那里风气闭塞，民智不开，与外界很少联系。

谭家世代务农，有少许土地，力耕自食。谭人凤有兄弟六人，他最幼，靠兄长们的帮助，入私塾读书。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在封建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下，他从十几岁开始，“尚泥于试帖词章，未究时事”，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没有成功。1890年他告别了科场，在村内义学当塾师，直至1895年。

2 这年，因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中日战争中战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重危机，全国人心震动。因此，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发动救亡图存的变法维新运动。这年暑假，耳目闭塞而又在科场上失意的塾师谭人凤，偶然从回乡的邹价人（代藩）处得知许多国家大事和维新运动的情况。从此他眼界渐开，“思想因之一变”。他的维新思想“跃跃不能止矣”。

1896年，谭人凤仿照“泰西教法”，在家乡创办福田小学堂，聘请有维新思想的邹价人等担任教员，选学有关时论文章，“以开学子智识”。8月，变法维新运动的喉舌《时务报》在上海创刊，梁启超在该报上发表了許多宣传变法维新的文章。湖南的维新运动也渐有起色。这些对谭人凤不能不产生深刻影响。

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大大激发了谭人凤的爱国政治热情。他千方百计地购阅《时务报》和其他维新宣传品，如饥似渴地学习西学，并逐步接受了康、梁的影响。他深有感慨地说：“余之思想受益于价人者固多，感触于时务报者亦不少。故尝谓彼时之梁卓如（即梁启超）启迪国人，功诚匪浅。”这一时期的谭人凤，是康、梁的信徒。1898年他参加了不缠足会，并成为新化分会的董事之一^①。

^① 《湘报》第166号附页，1898年9月。

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了改良主义在当时的中国行不通。戊戌以后，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又与帝国主义签订了卖国的“辛丑条约”，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加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开始兴起。这些事变猛烈地促使着具有爱国热忱和进取精神的谭人凤，跟随时代的步伐继续前进。他开始从维新救国的改良思想中摆脱出来，迅速转向革命，从此，他的“革命之思潮，遂蓬勃不可复遏矣”。他表示：“锄去”清朝这个“非类，斯吾志也”。

谭人凤从事反清革命活动，是从联络洪门会党开始的。1904年暑假，他得知革命团体华兴会联络哥老会准备举事的消息，受到很大启发。他深感过去教育救国“其道迂远，未能济急”，而发动会党倒是反清革命的好办法。因此，他结束了自己的执教生涯，参加洪门会党，“改与会党耆帅游”。他在家乡开山立堂，取名卧龙山，自做山主。他还在宝庆分设山堂，广收党徒，并多次去本县时荣桥，与那里的会党首领周辛铄（叔川）取得联络，在一字山头设坛聚义，共谋反清革命。谭人凤的组织能力和毅力，很受时人称道，说“新化之组合会党实行革命者，当推公（即周辛铄——笔者）与谭石屏两人为首，均果敢坚决，冒死难而不移其志”^①。原湖南《大公报》主笔新化籍李抱一在《周叔川先生传》一文中也说：“吾邑实行革命者，首推石屏、叔川两先生。”^②

谭人凤联络会党，经常奔走于辰州、沅州等地和黔、桂等省，他还派人去湘南的衡州、永兴、郴州、桂阳等县联络，这些地方的会党“皆乐听命”。因此，很快谭人凤联络的会党势力“弥漫于全省”。

①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第一期第201页。

② 《近代史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1981年第一期第205页。

但是，谭人凤发动会党举事失败了。在清吏的追捕之下，他被迫于1906年1月到长沙避难，9月逃亡日本。他沿长江顺流而下，经过武汉、南京、上海等地，然后漂洋过海，于11月25日到达东京。谭人凤在流亡途中，悲愤交集，思想在发生着急剧的变化。他“放开眼孔看寰尘”，“眼界胸襟顿为之一阔”。他回忆自己走过的人生道路，深感过去发动会党起事是“抱一部落主义以自雄，至此则爽然若失”。

谭人凤在南京流连月余，看到过去的古都南京城“凄凉满目”，他慨叹说：“山河大地今谁主？畿辅凌夷王气消。”他决心“提起刀和剑”，去海外结识革命同志，要推翻清王朝，做国家的主人，以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在上海，他看到帝国主义凌辱中国人民的悲惨情景，愤慨地说：“间抚七弦抒阮恨，声声怨恨四夷侵。一朵梅花卜天心，问几时可把租去地，收归故主人。”总之，这时的谭人凤，在向着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道路迈进。因此，他到东京的第七天，即12月3日，便由黄兴介绍，加入了同盟会。

谭人凤在东京进入法政大学第五期作插班生，学习法政知识和革命理论。他还参加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同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派的思想大论战。他坚决站到革命派一边，对梁启超及其保皇谬论，进行了严厉批判，从而与梁启超和改良主义实行了彻底的决裂。后来，谭人凤又积极参加了同盟会组织领导的历次反清武装起义，经受了严峻的考验，逐步锻炼成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

(二)

1911年成立的中部同盟会及其以后的革命活动，直接促成了

武昌首义，因而在辛亥革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谭人凤是中部同盟会的主要发起者和组织者，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同盟会在两广和云南边境发动的多次起义的失败，引起了同盟会内部普遍的不满。1910年6月中旬，为了改变同盟会的松散状况，谭人凤请求秘密来到东京的孙中山“改良党务”。孙表示同意，答应“可容日后约各分会长再议”。不久，孙中山匆匆离去，谭人凤受众推举，召集在东京的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研究改良党务问题。宋教仁主张组织中部同盟会，作为长江流域革命的策动机关。谭人凤“力韪其议”，其他与会者也极为赞成。10月，谭人凤就此事到香港征询黄兴的意见，取得了黄兴的同意和支持。

1911年2月，谭人凤奉黄兴之命，到香港筹备广州起义。他总结同盟会历次起义的经验教训，向黄兴建议说：“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有为，愿加以注意，俾收响应之效。”黄兴采纳了他的意见，派他携款5000元，往长江流域进行联络。

谭人凤先到上海，向宋教仁等传达了黄兴的意见，督促他们加紧进行，以3000元交给郑赞丞负责办理苏浙皖赣等省党务事。谭人凤赶到武汉，召集党人孙武、杨时杰、杨玉如等，向他们介绍了在上海的联络情况，希望他们加入中部同盟会，以便联成一气，一致响应广州，并交给居正、孙武800元钱，作为活动经费。之后，谭到长沙，约集党人焦达峰、邹永成、曾伯兴等开会，讨论组织革命机关，响应广州，以700元交给曾伯兴开展筹备工作。谭人凤在长江流域进行的组织和发动工作，不仅为后来中部同盟会的正式成立打下了基础，而且对推动这些地方的革命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前，年过半百的谭人凤赶回广州坚决要求参加敢死队。黄兴因他年老，且得处理善后，婉言劝阻。谭说：“君等敢死，余独怕死耶？”表现了为革命勇敢献身的精神。但他持枪走火，终被劝阻。广州起义的失败，给革命党人造成了严重损失，但也激励了全国人民，尤其是两湖的革命党人“进行益猛”，“已由被动而急转为主动之势”。5月，谭人凤到武汉，又毅然担负起长江流域的领导责任。他深深地感到：“党事者，党人之公责任也。有依赖性，无责任心，何以对死友于地下耳！”因此，他返回上海，于1911年7月31日，同宋教仁等正式成立中部同盟会，并发表宣言。其总部下设庶务、财务、文事、交通和会计五千事，谭人凤任交通干事。8月2日，谭又被推举为总务会议长。

由谭人凤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对同盟会以往的失败作了认真的总结，认为其原因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批评同盟会以前的做法是“惟挟金钱主义，临时召集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表示今后要“培元气，养实力”，不轻于发难。根据同盟会存在的某些弊病，“宣言”表明要在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凡事须经评议后始执行”，防止“专制”独断，要求加强团结，消除“省界”观念。“宣言”在谈到中部同盟会与同盟会本部的关系时指出：“奉东京本部为主体。”“宣言”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同盟会的实际情况。“宣言”提出的“合议”制，要求加强团结，消除省界观念和“培元气，养实力”、不轻于发难的思想，对指导当时的革命是十分有益的。

中部同盟会的成立，是革命发展的产物，是谭人凤、宋教仁等作出的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决策。它对以武汉为发难地点的军事行动方针，也作了详细部署。黄兴得知中部同盟会成立后，立

即致函说：“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连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①孙中山对谭人凤等将军军事策略转移于长江流域的行动，也表示赞成。革命实践证明，在武昌首义和长江流域各省纷起响应的斗争中，中部同盟会起了领导和推动作用。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是适时的，是正确的。谭人凤为此而建立的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三)

黄兴在赞扬谭人凤对武昌首义所作的贡献时说：“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愧我年来频败北，马前趋拜敢称雄。”^②

武昌首义之前，湖北革命党人到上海请黄兴、谭人凤和宋教仁来武汉领导起义。当时黄在香港，谭有病住医院，中部同盟会决定派宋先往。但宋一拖再拖，未能成行。谭见事急，提前出院，于1911年10月8日前往武汉，10月14日赶到武昌，参与首义的领导工作。在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两个月的时间里，谭人凤往来于武汉、长沙之间，为巩固两湖革命阵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力主湘督夺回全权。

10月22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首先响应武昌首义，率领会党和部分新军，杀死巡防营统领黄忠浩，在长沙发动起义，建立了湖南军政府，并分别出任正、副都督。但以谭延闿为首的立宪派，从权应变，将湖南谘议局改头换面，成立了省参

^① 《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9页。

^② 《黄兴集》，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页。

议院，由谭任议长。立宪派采用“军民分治”、限制都督权力等办法，架空焦、陈，一步步地攫取权力，并密谋推翻革命政权。这样，湖南刚刚建立起来的革命政权，处于危机之中。

谭人凤对“湖南绅士擅权，颇有虞心”，便向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领得快枪2000支、子弹200万发，于10月26日抵长沙，准备给革命派以支援。他当夜召集焦达峰等人谈话，敦促他们“采取果断手段”，取消由谭延闿把持的参议院和民政部，由都督府总揽全权，并对立宪派进行反击。10月30日，同盟会邀集立宪派士绅在原谘议局开会商议都督府组织法。谭人凤关于取消参议院和民政部的提案获得多数通过。谭延闿被迫辞职。但第二天，立宪派发动了反革命政变，焦、陈被杀害，谭延闿夺取了都督职位。焦在被害前很惋惜地说：“悔不用谭石屏（人凤）之言，先除若辈。今竟为若辈所算。”^①谭人凤当时关于处理湖南问题的主张是正确的。但是，焦达峰等一些年轻的革命党人缺乏经验，没有采纳谭的建议，并一再妥协退让，终于造成了湖南革命的悲剧。

第二，支撑危局，保卫武昌。

11月24日谭人凤回到武昌。当时汉口早已失陷，黄兴所指挥的汉阳保卫战，也节节败退，援鄂的湘军王隆中部和甘兴典部，已退下前线，汉阳危在旦夕。谭人凤奋不顾身，立即渡江与黄兴商量作战计划，并往王隆中部发表演说，鼓励将士重返前线。但当时汉阳保卫战败局已成。27日革命军退守武昌。

武昌首义后各省纷起响应，整个形势朝着有利于革命方面发展。汉口、汉阳的失守，只是革命的局部失利。这时，黄兴主张放弃武昌去广东，然后再回师收复武昌。对此，谭人凤和湖北革

^①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85页。

命党人坚决反对。谭劝黄说：“君不留武汉待援，将何往？”黄答：“武昌已不能守，俟由广东率兵多带机关枪来，再议恢复。”谭人凤当即反驳道：“广东水、陆两军握于李准、龙济光手，断不可去，万一不愿留，宜驻上海，速攻下南京为根据地，方为得计。惟军械须分一半与我。”黄不听谭人凤等人的劝阻，于汉阳失守的当天晚上前往上海。12月1日，湖北都督黎元洪也离开武昌逃往葛店。武昌群龙无首，“市街黑暗，商民转徙一空，军士弃城逃者，尤不知凡几”，“金谓革命以来之危险期间，莫此为甚”。在此危难时刻，12月6日，谭人凤受革命党人拥戴，出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节制武昌各军和各省援军。他“冒风雨霜雪，能甘劳苦”，“昼出洪山，夜归武昌”，多次命令各军积极防御，并作再战的准备。他还向武昌革命军发出《诰诫各部文》，说：“全国之枢纽在武昌，武昌之安危在各兵士，各兵士之勇怯，全在各将领之训率。”号召各军将士，“同仇敌忾”，誓死保卫武昌。谭人凤在布告中指出能够战胜敌人的有利条件有五项：一、有长江之天险；二、各省援军已到；三、全国大多数省份已响应武昌；四、敌军饷乏，我军饷足；五、我军已购得机关炮等军火。《诰诫各部文》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大体是正确的，并为安定民心，鼓舞士气，保卫武昌，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武昌首义区的巩固，为革命的发展赢得了最宝贵的时间。谭人凤临危不惧，支撑武昌危城的英雄行为，为当时和后人所高度赞扬。章太炎曾说：“若夫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唯君一人而已矣。”

（四）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虽然被推翻了，但辛亥革命的果实不久却被袁世凯夺去。很多革命党人对此非常愤慨，不甘心革命的失败，继续坚持斗争，谭人凤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者之一。为了保卫民主共和制度，反对封建专制的复辟，他进行了顽强的斗争。

第一，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南北议和，反对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和清皇室优待条件，反对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反对黄兴辞南京留守职。

10

孙中山刚从海外到上海时，曾表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并为此作了很多努力。但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压力下，不少革命党人妥协退让，孙中山不得不同意与袁世凯议和。谭人凤既有远见卓识，又富于勇气，旗帜鲜明地反对议和。他明确地指出，停战议和“实堕虏计而懈士心”，“则大错特错也”。2月9日，谭人凤致孙中山电，请“为中国苍生计忧危”，不要议和退让，要坚持北伐。谭人凤老当益壮，意气奋发，以北面招讨使的名义，在上海组织北伐机关，发表北伐宣言，表明北伐的决心。他还招兵练武，准备配合孙中山的北伐计划举兵北上。他敢于反对议和的错误潮流，指出议和的严重恶果，这是非常可贵的。后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谭人凤也表示坚决反对，指出孙中山“拱手推让，实是一大弱点”。孙中山后来也说过：“我的辞职是一个巨大的政治错误。”^①

为了争取清帝早日退位，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了清帝退位优待条件和清皇室优待条件。谭人凤也予以严厉批驳。2月8日，他致电孙中山、黄兴等，指出保留清帝尊号，“貌似文明，实伏乱源，窃不敢取”。他列举五条理由，指出保留清帝尊号的危害：

① 《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35页。